

# 移民是难题，也是欧洲足球的福祉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议会发表法国“绝不接受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驱逐难民”的言论时，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法国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基里安·姆巴佩正成长为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难民问题是整个欧洲正面临的一大难题，但马克龙一定知道，移民对于法国足球的贡献不言而喻：姆巴佩的父亲正是数十年前以难民身份从喀麦隆来到法国，而这支正在追逐最高荣誉的法国队阵容中，纯正的法国人其实只有两位而已。不仅只是法国队，昔日血统纯正的英格兰与比利时正变得同样色彩斑斓，丹麦、瑞士都通过大批移民球员的加盟重装上阵，连俄罗斯、瑞典这样的“边缘角色”都开始享受移民足球的红利，本届世界杯正不可避免地成为移民球员的舞台。

## 欧洲足球正因移民而获益

法国国家队在决定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时，曾遇到了幸福的烦恼。以至于有人认为，法国队的落选球员如拉卡泽特、本泽马、马夏尔、拉比奥特等人可以组成另外一套阵容征战世界杯。法国足球人才之所以“过剩”，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的贡献。法国对移民的态度非常宽容，也正因为此，德尚手中握有庞大的移民球员资源。

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23人中，法国队内纯正的法国人只有两位——右后卫帕瓦尔和替补前腰托万。乌姆蒂蒂（喀麦隆）、曼丹达（民主刚果）出生在非洲，而勒马尔则来自法国的海外省瓜德罗普，同样有海外省马提尼克血统的是瓦拉内，而其他深色皮肤球员都无一例外地拥有非洲血统，比如父亲来自马里的有坎特、西迪贝、登贝莱（其母有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血统）；马图伊迪是安哥拉和刚果混血儿；而博格巴的父母均来自几内亚，其哥哥弗洛伦丁和马蒂斯均出生于几内亚，如今为几内亚国家队效力……而非北的前殖民地国家也为法国队输送了大量人才：费基尔与齐达内一样来自阿尔及利亚家庭（其实姆巴佩也有一半阿尔及利亚血统），拉米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而法国最早的世界杯英雄方丹其实是出生在摩洛哥的法国-西班牙混血）。这支法国队还有了来自亚洲的代表，其中门将阿雷奥拉的父母均为菲律宾人。甚至队内的白人也有许多有着国外的血统，比如格里兹曼的母亲是葡萄牙人，吉雷斯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左后卫埃尔蒙德斯来自定居法国的西班牙家庭。

何止法国，比利时与英格兰也从移民政策中受益，移民球员均占本国世界杯阵容的近五成。比利时足球能有今日成就，与上世纪中期北非独立运动和刚果军事政变导致大批难民涌入本国直接关系。当年比利时政府照单全收的做法曾引发民众恐慌，却不曾想为今天比利时足球的崛起埋下种子。在距离巴黎不远的布鲁塞尔“金沙萨区”，成了另一座足球移民的富矿：卢卡库的父母是刚果裔移民，费莱尼和沙德阿来自摩洛哥家庭，阿扎尔则是阿尔及利亚后裔……

事实上，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14支欧洲球队中，除了冰岛、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三队，其他球队均有输入型移民球员（后两队其实都有输出型移民球员，如克罗地亚的拉基蒂奇和塞尔维亚的维耶里科维奇均出生于瑞士），甚至连一向风评保守的波兰和俄罗斯也有此例，波兰的4号中卫比亚瓦·西奥涅克和俄罗斯的主力右后卫戈马·费尔南德斯均来自巴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移民球员的出现和普及，让实现多元文化交融的欧洲足球有了质的提高。

## 1998年的“3B”队曾令法国空前团结

在欧洲，足球层面的多元文化融合从来都比社会融合更进一步。法国、比利时与英格兰队内的移民球员占比

均远远高于本国的移民人数占比。移民后裔在足球上的成功，也反映出移民在其他职业方向上的上升通道有多狭窄。法国作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写作《世界的重量》时采访了大量法国边缘人群，多数人在抱怨移民后裔“无所事事，破坏社区”，甚至同样贫困的白人也在抱怨阿尔及利亚青年“不工作，不吃苦，充满暴力，是麻烦的来源”。在移民后裔找到改变命运的新方式之前，足球成了少数族裔年轻人跨入上层的最快捷方式。

今天的这支法国队很难不让人将其与1998年在本土夺冠的那支法国队联系在一起。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的那支混编部队，堪称法国社会多元文化、种族融

合的典范。包括齐丹、德塞利、卡伦布、亨利、维埃拉、图拉姆、特雷泽盖和皮雷等在内的13人均为移民后代。除了阿尔及利亚裔的齐达内，前锋德约卡夫是亚美尼亚混血，后卫图拉姆出生于法属瓜德罗普岛，中场的维埃拉则来自塞内加尔……正因为此，法国人将其称为“3B”球队。所谓“3B”即指法语“Black”“Blanc”“Beur”三个单词开头的“B”，也就是“黑色”“白色”“黄色色”，意指这支球队由黑人、白人与阿拉伯人组成。

1998年7月12日，法国队在法兰西大球场以3比0完胜巴西，历史上第一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法兰西大球场看台上回荡着“法兰西万岁，黑人-白人-阿

拉伯人”的歌声，人们兴高采烈地一起挥舞着法国国旗与阿尔及利亚国旗。据当年报道，法国人在巴黎举办了自二战胜利以来最盛大的街头派对，这成了一个让所有法国人情感得以高度共鸣的日子。“3B”球队的夺冠被法国人视为“民族大团结”的重要象征，使国家获得了迫切需要的空前团结与凝聚力。

距离“法兰西之夏”过去已有20年，与1998年相比，如今呈现在法国人面前的是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和空前加剧的种族问题，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极端对立的宗教和族群矛盾，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法国舆论寄望于这支甚至比1998年“3B”球队更能代表

多元文化的法国队，能让国家再次团结在一起。在球队出征俄罗斯世界杯前的6月初，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克莱枫丹的训练基地看望国家队时表示，希望他们能带回胜利，并向着“国家大团结”目标迈进：“我对你们非常有信心，全体法国人也对你们有信心。你们是帮助我们国家恢复自信的人。”而在半决赛时，马克龙也亲自前往圣彼得堡泽尼特体育场为法国队打气助威。他希望，如今这支更多元也更年轻的法国队能像1998年的“3B”队一样取得伟大的胜利，帮助法兰西走出创伤，恢复自信。至少现在，法国队距离奇迹又近了一步。



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法国队首发球员拍摄全家福。其中只有手执队旗的帕瓦尔一人是“纯正的法国人”。

视觉中国

# 在德国，足球和移民是无法割裂的话题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2018年的夏天注定因为足球而喧闹。当俄罗斯世界杯即将迎来决赛的高潮，作为卫冕冠军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德国队却已经回家两个星期了。强大的德国队在小组赛即告出局，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而留意国际新闻的读者们一定知道，就在德国队折戟沉沙之时，德国国内的政坛也不太平，由于总理默克尔和执政联盟社盟在难民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这位德国队“头号球迷”所领导的联邦政府一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德国，足球向来被认为是政治的延伸。在德国队爆冷出局后，德国媒体也尝试将德国队的失利和德国政治的乱局联系起来。当然，绝大部分媒体还是愿意给两者建立起并列的关系，认为德国近期“国运不顺”。正如一名德国网友在论坛留言所称：“过去，我们德国有两样东西以发挥稳定闻名世界，一个是我们的足球队，另一个是我们的政府。而现在，他们成了过去式。”

也有部分媒体试图在德国队失利和政治混乱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德国《体育图片报》撰文指出，德国队内部早已产生了不和和内斗，正是内斗导致德国队在世界杯中遭遇惨败。据该媒体称，这支德国队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拜仁慕尼黑球员为主，主要成员包括诺伊尔、穆勒、胡梅尔斯和前拜仁球员克

罗斯，另外一派则以赫迪拉为首的所谓“移民派”，其主要成员还有厄齐尔、京多安和来自拜仁的杰罗姆·博阿滕。

据说，在首战对阵墨西哥前，“拜仁派”对勒夫启用厄齐尔作为首发不满。不满的源头就是5月中旬厄齐尔和另外一名国脚京多安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并公开为土总统选举站台，这两位土耳其裔引发了对国家的忠诚问题。而“移民派”则对诺伊尔、胡梅尔斯、克罗斯和穆勒等组成的球队委员会非常不满，因为队委会没有在教练组弃用勒夫伊·萨内这件事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萨内的母亲虽然是曾夺得洛杉矶奥运会铜牌的德国艺术体操名将雷吉娜·韦伯，其父却是来自塞内加尔的移民。

德国足协立刻对此类报道提出了反击，表示这些对于德国队内部分裂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球队非常团结。德国《南德意志报》也指出，这些强行将足球和政治相联系的做法有些牵强附会，也显得过于敏感。“拜仁派”与“移民派”的内斗，很可能只是捕风捉影的传说，但如果回顾难民危机爆发以来的德国舆论，就会发现那些在德国队效力的具有移民背景的球员，确实背负上了原本没有的压力和纷扰。

2016年，时任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副主席高兰在接受德国第一大报《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称：“人们觉得杰罗姆·博阿滕作为足球运动员挺不错，但他们不想有一个博阿滕作邻

居。”在柏林出生的博阿滕母亲是德国人，而父亲是加纳人，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凯文-普林斯·博阿滕选择了为加纳而战，兄弟俩曾在2010年的世界杯赛场上直接对话，小博阿滕对德国的忠诚早已无须证明。高兰的这一表态立即引发了民众强烈的反应，随后德国舆论和政客也对他口诛笔伐。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高兰凭借其激烈的反移民和反难民立场，不仅没有失去参政资格，更是随后成为选择党的主席。而在今年世界杯第二场小组赛中，德国队未将厄齐尔列入首发阵容，德国选择党的另一位高层魏德尔对此评论称，这是选择党发挥了影响力的结果。在厄齐尔、京多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曝光后，魏德尔就在脸书上写道：“厄齐尔和京多安应该在家待着！”在这位右翼女政客看来，厄齐尔和京多安不应属于德国国家队。

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已有数百万计的难民涌入德国，这些难民在进入德国后给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频繁出现难民发动恐怖袭击、涉及例如奸杀这样的恶性刑事案件，德国社会对于移民的恐惧和反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移民”“难民”“宗教”“融合”等词汇更是成了德国舆论的敏感词。

土耳其人是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而厄齐尔、京多安作为第二甚至第三代土耳其移民，本被视为土裔融入德国社会的典范。然而，这两位球星却会见了埃尔多安，并称其为“我的总统”。这擦动了

德国民众本就敏感的神经，批判之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沃表示：“我们当然尊重有移民背景的球员的特殊处境，但埃尔多安先生并不充分尊重我们足协所认同的价值观。”很难想象，这些批评声不会影响到这两位球员参加世界杯的心情。

在本次世界杯上，每一次德国队的失利，有移民背景球员都会首先当其冲地遭受质疑。在爆冷不敌韩国队赛后，厄齐尔因为种族主义言论同看台上的德国球迷争吵的画面通过媒体传向了世界，也让真正喜爱这支球队的民众感到心痛。德国队出局后第三天，厄齐尔发布推特表示：“小组赛即遭淘汰，内心很痛苦。我们的确踢得不够好。我需要时间才能摆脱这份低落。”结尾处他加了“对种族主义说不”的标签。但已有不少媒体发布消息称，这位德国队史上最佳的土裔及有移民背景的球员，很可能就此退出德国队。

德国队在国内黯然解散，勒夫的留任也已板上钉钉。基民盟和社盟在难民问题上的妥协，也让联邦政府暂时远离了崩溃危机。而德国的难民危机却远远还未结束。根据民调显示，在保守的巴伐利亚州，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基督教社会联盟——该党在二战以后从未失去过巴伐利亚州的执政权。无论政治将如何发展，我们依然希望能给足球留下一片净土。（本报柏林7月11日专电）



《今日印度》7月16日

## 莫迪的挑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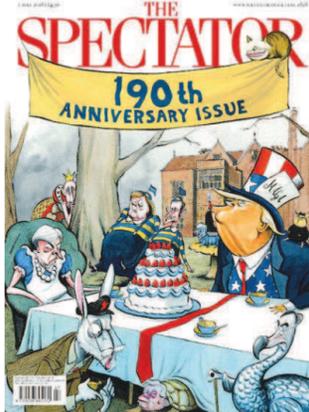
距离2019年的印度大选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总理莫迪的挑战者正渐渐浮出水面。本期《今日印度》杂志认为，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目前尚未表现出能挑战莫迪所需要的耐力与坚韧，但政坛女强人、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已有足够的雄心和能力去参与大选，相信她将给莫迪带来巨大压力。印度政坛不乏女性领导人，如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拉胡尔的母亲、前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等，这一次班纳吉又将带给印度人怎样的惊喜呢。



《经济学人》7月7日

## 印度女性

印度女性的低就业率是这个国家仍然如此贫穷的一大原因。过去十几年间，印度工作女性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女性就业率已从2005年的35%下降到如今的26%。然而，更多女性参加工作为印度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除经济利益之外，还有其他无法估量的隐形利益，比如工作女性更有可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投入更多资金，并对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有更多发言权。



《旁观者》7月7日

## 190周年纪念

190年前，《旁观者》的诞生就代表着英国幽默与民主的辩论；190年间，它一直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而发声。现在围绕欧洲大陆的和非移民主义，而是那些拒绝讨论的政客。只有政客愿意参与讨论时，问题才会更加容易解决。这就是我们今天努力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它。

## 行走世界

■张昕

清晨5点，阳光从百叶窗帘的缝隙中间无情地入侵，慢慢盖住我的床。这是白夜季节的圣彼得堡。凌晨一两点时还有粉色的霞光，几乎没有彻底变黑的时刻，不过三个多小时之后阳光又铺满城市的每个角落。最多只能睡四个小时的日子，短短两周我感觉身体快烧光了。

这正是白夜的圣彼得堡。城市中心荡漾着无休止的节日气氛，呆在屋里是一种罪恶，你只想走出去汇入人流。世界杯开幕那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们似乎一夜之间从地底冒了出来，填满了涅瓦大道。三五个人举着自家国旗几嗓子，就能引来一群人 and 手机的围观，如果再有几件乐器或者配上随便什么舞步，掌声、欢呼、歌声马上汇成一片海洋。

但是，离开了涅瓦大道和冬宫周边旅游者集中的区域，白夜的圣彼得堡又出奇的安静。我住在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三条主要河道之间的圣彼得堡——格里斯耶多夫运河边上，因为住处离马林斯基

# 这也是白夜的圣彼得堡

剧院不远，楼下还有一家专门卖旅游纪念品的大型超市，所以刚入住时担心周围会很吵。出乎意料的是，不过晚饭时分，河边小巷内已经见不到什么人。一部分圣彼得堡当地人在世界杯开幕前已经离开对他们而言拥挤嘈杂的城市，趁着好天气去国外或者近郊的自家乡间小屋度假去了。河道边那些略显老旧的沙俄时期建筑几乎都是半空的，不少房间或在重新装修或打出了出租的招牌，这些空房相当一部分将被改造成商用空间出租，入住的高峰期看来要等到入秋了。

13年前第一次来俄罗斯时已经被告知，苏联解体以来，圣彼得堡的城市改建速度落后于莫斯科大约10年到15年。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资本和政治资源向莫斯科进一步高度集中，让两个城市的更新改造速度拉开了距离。过去两年，莫斯科的城市重建速度又经历了“飞跃”，中心城区的光鲜亮丽已经令人感叹：“现

在的莫斯科是一座真正的欧洲城市”。相形之下，彼得大帝心目中“通往欧洲的窗口”，经常被称为“比欧洲还要欧洲”的圣彼得堡，似乎懒洋洋地躺在自己帝国时代的旧日堂皇之中，半醉半醒、不愿起身。除了中心区几处旅游景点修葺一新之外，城市中心区大多数的老建筑都是一副百废待兴、又不愿复兴的模样。

贪便宜，赶早场去和大妈大叔排队看了一部刚上映的新片《盛夏》。关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圣彼得堡时下摇滚传奇人物的传记片，被拍成了两个多小时超长的MTV，天籁般的律动恣意表达着属于夏日青春的情绪。吸引我的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影片里展现的1980年代的圣彼得堡。看完电影走出剧院，顶着中午的阳光，我立刻意识到，剧中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场景其实不需要太多调整，直接就可以在当下的圣彼得堡展开，调成黑白色，就是导演想要的1980年的感觉。

再从市中心向外走远些，特意按图索骥去看了圣彼得堡几处构成主义建筑比较集中的地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圣彼得堡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曾是构成主义的天下，作为泛欧洲建筑运动中的苏联分支，这个先锋运动在建筑领域的实践饱含对革命后重构新世界、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想象热情，包括摒弃个人转而超越到一种新的集体生活，这种新生活又不同于之后苏联被众人诟病的“火柴盒”式集体住宅。在白夜的阳光下，我看到的是各种简洁线条和几何结构大胆组合塑造出的学校、医院、活动中心、邮政局、食堂、浴室，是一个个曾经孕育过全新生活理念的社区。虽然这些没有成为旅游圣地的文化遗产如今维护得不如人意，但在八九十年之后，这些建筑大部分依旧在使用，当年社区的基本结构也得以延续，在那里还能看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站在老城区任何一个高点向西北角望去，一座462米高的火焰状大楼清晰可见。这座作为欧洲最高建筑的拉赫塔中心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部。大楼的最初选址是在历史城区内，但被认为会破坏传统的城市天际线，同时造型象征着莫斯科的铜臭气，因此最初方案遭到圣彼得堡多个市民组织和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反对。如今，离开历史城区的拉赫塔中心即将完工，甚至有可能成为圣彼得堡新市中心的标志。我所在大学的俄罗斯同行不止一次向我解释本校莫斯科分校和圣彼得堡分校政治学/国际关系同行圈内的地域差别：莫斯科的同行离权力太近，少了点学院派对于研究和教学的重视，政治立场上近年来也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而圣彼得堡的同行更认同自己属于一个超越俄罗斯的国际学术共同体。而白夜期间也是他们举办各种暑期班、国际学校的最好时机，因为白夜的圣彼得堡对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有种特殊的吸引力。

要把这么多关于圣彼得堡的影像、符号都糅在一起，白夜时期缺觉的我有那么点不专心。只能说，离开冬宫、涅瓦大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滴血教堂，这些都是白夜的圣彼得堡。

## 一周数字

### 3小时40分钟

俄罗斯“进步 MS-09”号货运飞船10日上午把一批补给运送到国际空间站，从启程到抵达全程耗时不到4小时，创太空“物流”速度新纪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起飞3小时40分钟后，飞船以自动模式对接国际空间站，比预计抵达时间提前9分钟。这是“进步 MS-09”号首次采用“超快”模式飞行。先前，同一航程耗时最短5小时39分钟，最长两天时间。

### 800万

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近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自1978年首次试管婴儿诞生以来，全球已有超过800万试管婴儿降生人世。报告估计，目前全球每年实施的试管婴儿治疗周期超过200万个，目前每年成功周期超过该技术生育的婴儿人数已超过50万。